

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

Translation as Hermeneutics

翻译与诠释

王 宾 编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H059/76

2006

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

翻译与诠释

王 宾 编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与诠释 / 王宾编著. —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

ISBN 7-5446-0252-4

I. 翻… II. 王… III. 翻译理论—研究 IV.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34861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江雷红

印 刷: 上海信老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890×1240 1/32 印张 8.5 字数 236千字

版 次: 2006年12月第1版 200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3 100 册

书 号: ISBN 7-5446-0252-4 / H · 0109

定 价: 15.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本社调换



总 序

翻译研究是不是一个学科,翻译有没有“学”,现在不应该再费时间论争了。董秋斯 1951 年就提出要建立翻译学,要写出两部大书,一部是《中国翻译史》,另一部是《中国翻译学》。苏珊·巴斯纳特(Susan Bassnett)和安德列·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在为《翻译研究丛书》写的总序中第一句就宣称:“The growth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s a separate discipline is a success story of the 1980s.”(1993)我国 1979 年就开始招收翻译专业的硕士研究生,1986 年国务院学位办公布了首批“翻译理论与实践”(二级学科)的硕士点,现在已有一大批以翻译研究为学术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1989 年以来,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都陆续设立了一些翻译研究项目,1992 年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学科分类与代码》,把翻译学正式定为语言学(一级学科)中应用语言学(二级学科)之下的一个三级学科。虽然这个学科定位还不够科学,但这个学科的存在已被公认。这说明学科的产生和发展不是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而产生和发展的。

近 20 年来,这个领域的中国和外国学者都在努力加大研究力度,拓展研究领域,深化研究层次,陆续出版了不少翻译学研究的新成果。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为满足国内翻译教学的需求和推动这个学科的发展,经过精心选择,引进了一套“国外翻译研究丛书”(现已出版 29 种),这在我国翻译界还是第一次。这套丛书在翻译教学和研究中已



经并将继续发挥它的重要参考和借鉴作用。

但是引进与借鉴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结合我们自己的翻译研究和教学实践进行新的创造。怎样创造?许多学科的发展史证明,要创造就要中外结合。怎么结合?中国学术史告诉我们,要结合就要以自己的研究为根基,以国外的研究为参照,借鉴其理论与方法,改造和创立基本范畴,建立新的范畴系统。这个以自己为主的中外结合的原则就是学科建设的方针,也是我国翻译研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对一个学科的发展来说,引进国外的理论和方法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结合我们的翻译实践、翻译教学与研究,写出与我们自己的实际密切结合的论著。国内已经出版了一些这样的著作,对翻译学的建设起到了某种程度的推进作用,功不可没。但从理论的系统性和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上来说,我们还没有一本多数人认可的《翻译学导论》。此外,在中国传统译论的继承性研究、外国译论的借鉴性研究、翻译实践(包括翻译教学实践)中新问题的探索性研究、相关学科(如文化、心理学、语言学、文学、社会学、哲学等)的吸融性研究以及方法论的多层次研究(包括本学科的和相关学科的)等几个重要领域,也都缺乏高水平的系统研究的论著。

为了进一步推动翻译学的研究与发展,满足这个学科研究生教育的教学与研究的需求,我们特别组织国内专家撰写以翻译学学科本体研究为主的系统的理论性论著——“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在筹划此套丛书时,我们了解到中山大学“985”学科建设项目中也正组织编写“中山大学翻译研究丛书”;我们很高兴把他们的这些选题纳入到“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中来。本丛书是一个开放性的系列,我们撰写、约稿的原则是:(1)为翻译研究类的学术专著,应充分反映本领域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2)追求理论的系统性和学术观念与研究方法的创新性,目的是对翻译学的发展和翻译人才的培养能起重要的推动作用;(3)用汉语撰写。读者为高等学校翻译以及其他相关专业的教师、研究生,翻译学界、语言学界以及文学、哲学与心理学等学界的翻译工作者和爱好者。

翻译是人类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活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最



重要的手段和途径之一。I·A·理查兹(Ivor Armstrong Richards)曾说,翻译很可能是宇宙进化过程中产生的人类最复杂的一类活动。它的复杂性必然对我们的研究构成挑战,要求我们的研究不断拓展,不断创新,不断深化。从古至今,大体说来,人类对翻译的研究已有了直观经验式的、文艺学的、语言学的、文化学的等多种视角和方法。我们相信,我国的学者一定会同世界各国的同行一道,对人类这项重要而复杂的活动不断加以探索,进行多层面多角度的研究,为这一学科的发展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编委会

总
序

外教社引进出版的“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书目：

- | | |
|--|------------------------------------|
| 1. <i>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i>
《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集》 | Susan Bassnett &
André Lefevere |
| 2. <i>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s; Translation Theory
and Contrastive Text Linguistics</i>
《跨文化交际:翻译理论与对比篇章语言学》 | Basil Hatim |
| 3. <i>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i>
《目的性行为:析功能翻译理论》 | Christiane Nord |
| 4. <i>The Pragmatics of Translation</i>
《语用学与翻译》 | Leo Hickey(ed.) |
| 5. <i>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i>
《翻译问题探讨》 | Peter Newmark |
| 6. <i>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Problems and Methods</i>
《翻译学:问题与方法》 | Wolfram Wilss |
| 7. <i>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i>
《翻译教程》 | Peter Newmark |
| 8. <i>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i>
《语篇与译者》 | Basil Hatim & Ian
Mason |
| 9. <i>Language and Culture; Contexts in Translating</i>
《语言与文化:翻译中的语境》 | Eugene A. Nida |
| 10. <i>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i>
《描述翻译学及其他》 | Gideon Toury |
| 11. <i>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i>
《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 | George Steiner |
| 12. <i>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grated Approach</i>
《翻译研究:综合法》 | Mary Snell-Hornby |
| 13. <i>Deconstruction and Translation</i>
《解构主义与翻译》 | Kathleen Davis |
| 14. <i>Translation in a Postcolonial Context; Early Irish
Literature in English Translation</i>
《后殖民语境中的翻译:爱尔兰早期文学英译》 | Maria Tymoczko |

15. *Translating Cultures; An Introduction for Translators, Interpreters and Mediators* • David Katan
《文化翻译:笔译、口译及中介入门》
16. *Translation in Systems; Descriptive and System-Oriented Approaches Explained* Theo Hermans
《系统中的翻译:描写和系统理论解说》
17. *Translation and Gender: Translating in the 'Era of Feminism'* Luise von Flotow
《翻译与性别:女性主义时代的翻译》
18.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 Ernst-August Gutt
《翻译与关联:认知与语境》
19.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revised 2nd edition)* Edwin Gentzler
《当代翻译理论》(第二版)
20.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Mona Baker(ed.)
《翻译研究百科全书》
21.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Eugene A. Nida
《翻译科学探索》
22.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Eugene A. Nida & Charles R. Taber
《翻译理论与实践》
23.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book* André Lefevere(ed.)
《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
24.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André Lefevere
《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
25. *Translation Criticism; The Potentials and Limitations* Katharina Reiss
《翻译批评:潜力与制约》
26.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Lawrence Venuti
《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
27. *Translation Studies (3rd edition)* Susan Bassnett
《翻译研究》(第三版)
28. *The Map; A Beginner's Guide to Doing Research in Translation Studies* Jenny Williams & Andrew Chesterman
《路线图:翻译研究方法入门》
29.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Mark Shuttleworth & Moira Cowie
《翻译学词典》



目 录

一、跨学科研讨的理论准备

翻译与诠释——关于“不可译性”跨学科研讨的理论策划	… (3)
靶子材料之一：论不可译性——理论反思与个案分析	… (16)
靶子材料之二：经验	… (40)
Jingyan: Three Aspects of Experience	… (60)
“经验”的三层涵义	… (77)

二、“翻译与诠释”跨学科研讨会对话录

“不可译性”、翻译的“暴力”与翻译的政治/伦理问题	… (91)
---------------------------	----------

三、对“翻译与诠释”的反思

翻译语言的语言性及其解释性与政治性	… (231)
解读《翻译语言的语言性及其解释性与政治性》	… (254)

外語社翻譯研究會

編譯方法

一、跨學科研討的理論準備

中國社會科學院

語言學研究所





翻译与诠释——关于“不可译性” 跨学科研讨的理论策划

王 宾

“翻译即背叛。”(Traduttore, traditore.)

——意大利警句

“翻译是可能的,同时又是不可能的。”

——奈达(Eugene A. Nida)

—

在西方学界,源远流长的翻译研究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方才获得独立学科的身份(Edwin Gentzler:1993)。不过,就翻译的性质而言,语言学和哲学似乎早已达成共识:翻译即诠释(Roman Jakobson:1959; Richard E. Palmer:1969)。

从狄尔泰到贝蒂,诠释是个认识论问题;从海德格尔到伽达默尔,诠释是个本体论问题。这虽是诠释学内部的分歧,对如何诠释“翻译即诠释”却至关重要。一方面,它使“不可译性”问题的探究呈现出大相径庭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认识(knowing)与存在(being)的争执,解释(explanation)与理解(Verstehen/understanding)的区分,在翻译研究领域内被表述为:翻译的性质是科学,还是艺术? 认知为先的科学论者,往往以共时语言学为范式(Wilfram Wilss:1982);本体导向的艺术论者更重视语言的历史性和身处语境中的言者的介入(George Steiner:1998)。无论突出哪一个维度,翻译均与“权力”问题



纠缠到一起。将翻译的认识或本体问题,直接或间接(即:通过诗化/审美化中介)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这是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一大亮点。其后果之一是:翻译史和翻译过程的研究,被有意无意地纳入并从属于思想史、政治史或者福科意义上的谱系学框架。其实,“权力”(power)的语义,在西方学术理路内绝非局限于当下的经验性的政治权力和控制。它是“能力”(faculty 或 ability)的同义语,指向某种逻辑先在的能力或者能力之运作方式。康德从“先验范畴”中寻到此“权力”/“能力”;胡塞尔回溯到前概念状态下的“先验自我”;弗洛伊德认为更具基础性的“运作方式”(economy)不在思想或者意识,而是“无意识”;索绪尔转向非人格化的、作为系统的语言(la langue);福科则锁定了更具语用性的“话语”(discourse);等等。此“能力”是无限的,还是有限的?如果有限,在什么意义上有限?此有限如何成为可能?等等。这些哲学形而上追问,在翻译研究过程中转化为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之间的纷争。

二

在以作者(原文)为中心的时代,阅读(翻译)的宗旨是忠实地再现作者在原文中表达的意图。“再现”一语(represent/representation),浓缩了柏拉图以降两千余年的认知追求和心理积淀。它是词与物关系之经典表述(真值命题)在一般性阅读(翻译)活动中的折射,与“真理的符合论”有内在关联。完美的阅读(翻译),除语义(内容)的忠实“再现”之外,还要求在译文中重构原文的风格(形式)以及在风格中展现的趣味(审美)。在西学东渐过程中提出的“信达雅”翻译标准,表达了那种舶来的对真善美的形而上执著。另一方面,百年来的文学艺术批评实践表明:“作者中心”论者、艺术“模仿论”和“现实主义”的追随者,十有八九是“信达雅”乌托邦的同盟军。文艺和翻译共有的哲理支撑,是一直被显学意识形态奉为圭臬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在这个黑格尔命题之下,“不可译性”如同康德意义的“不可知”(agnosticism)一样,是作为“伪问题”而被排除的。



从尼采的“上帝死了”到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从德国的“接受美学”到北美的“读者反应”，作者(原文)中心观不断被质疑拷问，如今似乎已带着“本质主义”的标签而旁落于学术主流之外。但是，这并不等于说经验性读者或特定的译文可以反客为主从而合法地升格为新的中心。(在严重缺乏先验传统的汉语学术文化圈内，不少人确实是这样来解读/误读“作者之死”和“读者反应”!)在当代语言批评的架构内，“作者”或“读者”/“译者”，往往并不指代某个具体的实体。它是一个功能性概念或“函项”(function)，用来指涉特定历史时期写作或阅读成规(conventions)。“信达雅”是在本质主义的作者(原文)中心观氛围中形成，其要害却不在实体性“作者”或经验性“原文”本身。它首先预设了某种不受限制的认识/诠释能力。对此能力的康德式批判(critique)，是提出“不可译性”问题的认识论动因。明于此，“不可译性”就不是否定一切翻译/沟通的可能性，而是探测和勘定一切可能的翻译/沟通之边界线(limits)。它要追问：“信达雅”是如何不可能的？不是某一篇译文的“信达雅”如何不可能，而是一切已有的和将有的译文之“信达雅”如何不可能。如果说“自在之物”(the noumenal or the thing-in-itself)的设定为近代科学认识论划定了边界，那么，任何西学意义上的翻译理论(即 theory 一词的原义)，都将不得不面对并回答“不可译性”之难题。

三

另一方面，“不可译性”又不仅仅是一个纯康德意义上的认识能力问题。

早在公元 13 世纪，英国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培根(Roger Bacon)就认为：由于不同的语言之间的“语义域之错配”(the mismatch between semantic fields)，准确的翻译是不可能的。就心灵与语言的关系，17 世纪理性主义哲学家莱布尼茨(Leibnitz)指出：语言不是思想运行的工具，而是决定思想的一种媒介(John J. Gumperz & Stephen C. Levinson: 1996; George Steiner: 1998)。尔后，以洪堡特(von Hum-



boldt)为代表的 18—19 世纪人文主义语言学家们均认定一种语言的独特性无法与另一种语言的独特性相通约。于是,在那个时代论及翻译,要么以原文语言为中心,要么以译文语言为中心,没有中间路可走(wolfram Wilss;1982)。此析取式所隐含的“不可译性”哲学/语言学难题,在 20 世纪急功近利的汉文化圈内已荡然无存,只剩下“直译”或“意译”的工匠型浅层选择。

18 世纪新古典主义视语言为思想的外衣,同一思想可以由不同的语言外衣来表征。因此,用一种语言表达的思想,一定能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深受洪堡特语言观影响的浪漫主义文论则持“不可译性”的立场。德国浪漫主义运动认为,每一种语言都包含了一种独特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不同的“世界观”无法相互转换(Gumperz & Levinson; 1996)。这种“世界观”经历了从康德到雅可布森形式主义美学传统的筛选,在西方形成了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弱化的“不可译”论:淡化了指涉功能而仅仅突出形式主义审美功能的文本,基本上是不可译的。奈达(Nida)是我国翻译界较熟悉的一位持“可译性”立场的《圣经》翻译者和研究者,却也承认形式的不可译性:“Anything that can be said in one language can be said in another language, unless the form is an essential element of the message.”(Raquel de Pedro; 1999)

20 世纪 30—50 年代,一批关心文化人类学问题的北美语言学家们发现:被经验的世界,总是在语言中被区分和归类(division and classification),然后形成有关世界的知识;思想实际是遵循语言划定的路线来“解剖”自然以获得意义;所谓“真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语言习惯构建出来的;不同语言的语义结构相距甚远,它们以各自的方式建构出不同的“真实世界”。上述被称为“Sapir-Whorf 假设”的语言观,包含了两个相关联的原则:语言决定论和语言相对性。根据第一个原则,语言决定思维。后一个原则强调:操不同语言的人,以不同的方式感知、思考和认识世界。“Sapir-Whorf 假设”为文化多元论、价值相对论和“不可译性”提供了强大的语言学支撑。其影响力,并没有因为乔姆斯基“普遍语法”的提出和 60 年代认知科学的兴起而



衰退。

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在 20 世纪初提出了符号的“价值”问题 (valeur/value)。其核心思想是:任何一个表达式总是通过与其他表达式的对立关系才能获得自身的具有区分能力的意义 (distinctive meaning); 表达式之间的关系网络构成了一个系统,离开系统便无表达式可言。无论从语形(形式)还是从语义(内容)来考察符号的“价值”问题,都拓展了对“不可译性”的理论思考。就形式而言,作为系统而存在的“语言”(la langue),是表达式之间所有可能的关系之总和;索绪尔将之归纳为组合和联想两大类,两类关系的互动为意义之生成提供了最逻辑先在的必要条件。后来的语言学家将“联想”易名为“聚合”(the paradigmatic),并认为表达式之间的聚合关系才是“系统”之所在。就纯语言形式而言,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实乃聚合关系之间的差异。翻译是语言结构的彻底转换,表面意义的雷同无法掩盖系统的彻底扭曲。更贴切的问题是:在什么意义和多大程度上,结构的扭曲导致信息传递的受阻?

符号“价值”说对意义理论的建构或重构,使“不可译性”显得更加错综复杂。作为一种西学意义上的理论,现代语义学并不告诉我们某一个具体的意义是什么。它的任务是追寻一切已有和将有的意义之必要条件。必要条件很多,大致可归纳为三类,可以分开来考察,但在实际言语活动中却密不可分,缺一不可。它们是:指示意义 (denotation); 关系意义 (sense, 又称“含义”); 和所指意义 (reference) (John Lyons: 1995)。当表达式指代 (stand for) 了一类事物或事态或动作时,便有了指示意义。因此,指示意义与世界或实在 (reality) 之间有稳定的关系;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与世界中某一个特定的事物或事态或动作发生关系。后者已涉及情景上下文,属所指意义 (reference)。语言哲学家皮尔士 (Peirce) 用“类型词” (word type) 和“特型词” (word token) 来区分同一个符号 (如: dog/狗) 的指示意义和所指意义。指示意义 (类型词或者作为共相的概念) 属于语言系统,其性质是独立于话语 (utterance-independent)。从洪堡特到“Sapir-Whorf 假设”,其所言的语义结构,主要指概念系统,即指示意义。语言相对性问题的当代



研究者们还进入到言语行为发生的时空上下文即情景。这时,“不可译性”涉及的问题主要是:在什么意义上和何种程度上语境或语境类型是无法转换的?因此,涉及指示意义和所指意义的“不可译性”,是两个相关但又有区别的问题。索绪尔的贡献在于关系意义的发现和具体论证。根据这样的意义理论,词位“狗”不仅仅指示了外部世界中的一类事物,而且首先是以各种方式与语言系统内其他词位发生关系。正是这种关系网罗使“狗”的指示/所指意义成为可能。与指示意义一样,关系意义属于语言系统;但是,它与外部世界不发生关系,且逻辑地先在于所指意义。这就是索绪尔悬置经验性言者和具体的指涉对象(referent)的语义学理由。在语言哲学层面,也就是悬置了词与物的关系问题和涉及到心智(mind)的认识问题。如果坚守索绪尔意义理论,在论及“不可译性”时,就不会过多考虑(但不是否定)因语境的变迁(所指意义问题)而造成的翻译困难。索绪尔在论述符号价值时,间接提供了关系意义“不可译性”的经典例证:法语 mouton(羊/羊肉)与英语的 sheep(羊)可以有共同的意指活动(signification),却没有共同的价值;英语的 sheep 还与另一个要素 mutton(羊肉)发生关系。因此,英语 sheep 和法语 mouton 的关系意义无法互译,尽管我们可以通过语境分析来确定其指示意义是什么(Saussure:1960)。

1962年,科学史专家库恩提出了一个意义深远的论题(thesis):不同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问题(incommensurability)。它直接挑战维也纳学派逻辑实证主义语言观。后者认为: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完全可能,旧理论可以用新理论的语言来表达。在《科学革命的结构》第二版“后记”中,库恩又试图用“学科基质”(disciplinary matrix)来进一步阐明“范式”(paradigm)。不可通约,是指一种学科基质所包含的四个要素,无法与另一种学科基质所包含的四个要素相通约。这四个要素是:符号通式(symbolic generalization);共同体成员所承诺的共同信念;共有的价值;共同使用的范例(exemplars)。“不可通约”概念源于数学:无共同的计量尺度。在库恩的论域以及受其影响的语言、社会、文化领域内,不可通约具体化为:内容无法比较;语义无法互译;无共同的评估标准(Thomas S. Kuhn:1970)。不可通约引发了一场有关